

科技极权秩序与现代性困境：《美丽新世界》中人的精神图谱探析

赖屿萱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野人约翰、伯纳德、列宁娜和赫姆霍兹等四种典型人物为核心，构建了科技极权社会的精神图谱。通过反乌托邦叙事揭示了科技理性与权力制度对人性本质的系统性剥夺。本论文以典型人物的悲剧命运为切入点，通过剖析人物的符号隐喻分析科技极权秩序下的生存困境，探讨其分别对应的人文精神消亡、人性异化、科技奴役与人类觉醒受压抑等问题。结合现代社会的技术伦理、消费主义及制度性权力现象，具体分析小说中的生存困境在当代的现实投射，为解读科技时代的人性危机提供批判性视角。

【关键词】：《美丽新世界》；现代性困境；人文精神；权力制度；人性异化

DOI:10.12417/2982-3846.25.06.007

长期以来，学界对《美丽新世界》的研究多从消费主义、唯科技至上主义和极权主义等视角展开，聚焦于“新世界”对当时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发展的反思、批判与讽刺，与当下数字时代联系较少。且多剖析单一人物（如以女性主义视角解析列宁娜），重视其批判价值，忽视了作品中个人命运对宏大世界观的折射与对现代性困境的映射，弱化了其寓言性。针对现实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反乌托邦小说通过构建极端现代化的未来世界表达对当前社会的反思与批判，而在《美丽新世界》发表九十余年后的今天，赫胥黎所构建的未来已然成为现在，其寓言的部分实现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该作品的警示作用。

作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美丽新世界》区别于《我们》和《1984》的最显著特点是非显性强制监管。“在反乌托邦小说对乌托邦的反思与批评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反乌托邦小说对乌托邦得以建成的物质手段——科学技术及其可能带来的伦理、价值等问题的思考。”^[1]在“世界国”中，社会对人的控制并非以绝对权威与恐怖监视的直观压迫性面貌出现，而是化身为一套隐形的科技极权秩序——利用生物工程、医学成果和消费主义等工具实现权利规训。这种秩序通过重塑人的价值观、消费观，打造出麻木顺从的个体，使人在满足欲望和消除痛苦的过程中无意识地自愿接受了新世界科技极权的奴役。新世界中，四种典型人物的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们被挤压、被异化与被奴役的不同悲剧命运，其内在精神构成了这种秩序中不同程度扭曲的人的精神图谱，成为现代性困境的微观缩影。而其中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景观社会中人性异化、主体性

消亡等等现代性困境在现今数字时代已借助算法、社交媒体与消费逻辑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为此，本文将通过剖析不同个体的精神图谱，实证性地揭示科技极权秩序在个体层面的具体运作，并具体呈现该秩序所造成的现代性困境的当代形态。

1 人文主义的消解：夹缝中的人

约翰作为人文主义的拥护者与处在两种文化边缘的流亡者，其命运悲剧本质上是前现代人文精神（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与现代工具理性不可调和的冲突，反映出科技极权秩序下人文精神消解和人性异化的精神方面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在当代算法治理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得到延续，个体在数据监控和效率至上原则下面临着新型的精神流放。

约翰的悲剧始于其无归属的流亡者身份：生理上作为世界国孵化中心的贝塔——琳达所生的“白毛子”，因价值观冲突而被保留区所排挤；精神上受到《莎士比亚全集》的熏陶，又注定成为世界国的不阅读、没有痛苦和情感联结的所有人中的异类。约翰坚守自己的“道义”，即莎士比亚式的人文主义，这使他既与保留区的原始信仰和传统习俗格格不入，又无法与新世界追求虚假幸福的实质共存。这种对比式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落差感更加强了新世界“幸福秩序”的荒谬：一个消除了所有物质匮乏与痛苦的社会，却恰恰因扼杀了人的精神维度而造出了人类最深层的现代性生存困境。既然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生老病死、用替代激情治疗免去磨难、用药物麻醉达到快乐，就没有人再想要痛苦，只有约翰高呼：“我要上帝、诗歌、真实的危险”^[2]。“他需要的不是给予的快乐，要的是拥

有不快乐的权利，这是对极权主义和技术合理性的一种反抗，约翰将莎士比亚的诗奉为圣经般的箴言，用它推翻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谎言和虚伪。”^[1]约翰拒绝伯纳德时的高喊、与“主宰者”的争论、对列宁娜的辱骂和母亲死亡时的大哭等等都彰显了科技极权秩序下对已消亡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微弱呼唤。

约翰的反抗行为在新世界中的毫无效果反映了人文价值的消解。约翰的母亲琳达，死于过度服用“苏摩”。作为精神麻醉药物，“苏摩”让人感到极端的快乐、遗忘所有不快乐的情绪，就像是在度假一样。“过去未来多烦忧，吃上一粒复何求”^[2]，而滥用“苏摩”导致死亡其实是赫胥黎给出的警告：只享受技术构建出的虚假快乐，就会失去人最重要的本性和价值。

约翰受母亲死去的刺激，做出扔掉“苏摩”的疯狂举动，这是他作为人文主义守护者做出的反抗。然而从新世界人的疯狂阻止来看，他们已经病入膏肓。另外约翰试图以苦行僧的方式进行赎罪，却被新世界人当作娱乐节目，“我们要鞭子”的大喊成为了“娱乐至死”的宣言；约翰的自杀，沦为了打卡景点。同时自杀作为人文主义流亡者约翰对新世界失望至极的终极反抗，反映了对社会的无人性无价值的严厉控诉；新世界人作为这一“猎奇”行为的“观影者”的回应，则反映了技术社会对严肃性的谋杀，是工具理性碾压价值理性的社会中人性的异化。

在当代社会，约翰所代表的两种文化“夹缝中的人”映射为社交媒体用户“真实自我”和“算法偏好塑造的自我”的摇摆状态：一方面渴望表达真实情感，另一方面又需迎合流量逻辑（如美化苦难、制造冲突）。用户在不同短视频的停留时间和搜索偏好塑造出虚拟世界的“算法自我”，然而同时也被流量逻辑裹挟，被“算法自我”的推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真实自我”。例如，用户小A因家庭矛盾在平台搜索相关内容后，算法持续为其推送“原生家庭创伤”类短视频。这些视频为博取流量，常将复杂的家庭矛盾简化为“决裂”或“卖惨”等极端故事。最终，小A真实的困扰被平台的戏剧化叙事所影响，甚至不自觉地自己的表达中开始模仿和表演这种被定义好的“痛苦”。这种持续的摇摆和浸染，最终导致了个体内在的深刻分裂。一如德波所说，“个性的消除是具体屈从于景观规则存在的幸附属物，这一存在甚至还在不断地除去真实经历的可能性，并从而除去了个人选择的发现。”^[4]正如约翰作为分裂的个体，其挣扎和摇摆的痛苦状态被新世界人“观赏”，当代人的“痛苦娱乐化”现象也尤为显著，深刻悲剧被简化为可消费的视觉奇观，没有共鸣的同情，只有猎奇的观赏，何其可悲。小A的个人化困扰被简化成“#原生家庭痛苦”的符号，成为了互联网的“逃离原生家庭”的狂欢中的一部分，其痛苦被更多人观赏、消费。

约翰所隐喻的人文主义流亡的困境在当下愈发普遍。在个体正在被社交媒体和算法机制分裂，群体追求猎奇，互联网充斥着假共鸣、真狂欢的当下，打破“被消费”的困境、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已成为找回“真实自我”、重塑身份认同的必经之路。

2 无从反抗的驯化：被规训的人

伯纳德在小说的前半段展现出思考者和反抗者的姿态，但后半段成为了顺从于权力与制度的投机者。与其说他发生了转变，不如说他只是被激发出了作为新世界人的本性。伯纳德的“伪反抗”正反映了权力机制对人性的驯化，权力机制让人从根本上“无从反抗”和人的主体性与个性的消亡这一现代性困境。

伯纳德本来应该是一个正阿尔法（小说中等级由上至下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埃普西隆，同等级内再分正负），在新世界中将会是一个高大英俊、能力出众的领先性人物，却因为孵化过程中被错认为伽马，血液中被掺入了酒精，从而让他生长得弱小，经常受到别的阿尔法的嘲弄，这造成了他的自卑和孤独。伯纳德体格上的缺失在智力上得到部分弥补，他拒绝服用“苏摩”，拒绝与列宁娜性交，这在新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是他作为“反抗者”的自由意志和思考，一方面，伯纳德是赫胥黎所塑造的脱离新世界预设、生出了自由意识的“差异化人物”，用以与后面的转变形成强烈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伯纳德作为“异类”博取社会关注度的举动：不能拥有权力，就只能标新立异来彰显自己独特的思想性，从而弥补自己从不被尊重、被敬仰的权力缺失心理，同时也伪装自己害怕不合群的孤独的心理。这种心理并不是发自不认同科技极权秩序觉醒，反而正是为了寻求秩序的认可，是为了以另一种方式彰显自己作为正阿尔法“与众不同”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权力机制和基因中的阶级意识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伯纳德的两次“冰岛”危机显出了权力机制对他的人性实质性的异化。第一次伯纳德揭发了孵化中心主任，并在此之后借助野人实现了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飞跃，他两周内交往了无数个女性，禁欲与思考的人设在他在权力机制下的自我驯化中被打破，“伪反抗”的本质一览无余。第二次伯纳德出卖了朋友，即使他对现有体制不满，但因为他已经短暂的成为过了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权力运行机制带给他的“恩惠”，其优越感的实现和虚荣心得的满足都离不开他所处的阶级社会，所以当时面对体制的施压，他几乎是毫不犹豫，丝毫不顾与赫姆霍兹朋友间的友情、与间接带给他权力地位约翰的恩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在此刻化为乌有，伯纳德本质上仍然是希望留在这个社会、继续处在这个阶级的，这让伯纳德此前的“反抗”变得更为虚假。“‘顺从结构’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个

人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家庭还是文化生活上都已渐渐被工业社会的效率和权力所吞噬征服，个体及其个性也就逐步衰落和丧失。”^[5]伯纳德所拥有的短暂自我意识觉醒来源于不符合“集体”和“标准”的不被现有秩序认可，一旦他获得理解和认可，就失去了反抗的动机，所以他一开始在精神上区别于其他阿尔法的精神特质——个性与自我意识——在获得权力后也就顷刻化为乌有，这正是对权力制度异化人性的最大讽刺。

虽然伯纳德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应该是有别的感兴趣的事情，但其所受的睡眠教育将其禁锢在只需要享乐和工作的意识牢笼中，想不清到底是对什么事感兴趣。而他对权力的渴望似乎是在长期得不到应有社会地位和尊重的压抑之下的强烈反扑。在被约翰拒绝后痛苦又无奈地大喊出，即使得到的是虚假的幸福，但这让自己开心。潜意识里他知道是这种幸福是虚假的，能思考出自己不感兴趣；睡眠教育所灌输的权力意识又让自己甘愿沉迷其中。这里的睡眠教育是小说中权力机制压制人性的手段之一，即通过千百次对深度睡眠的儿童重复播放规训，灌输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观念。此外还有对婴儿的应激反应训练、基因设计等等方式。小说借伯纳德反驳不会“思考”的列宁娜的情节说出了可怕的真相：“你为你是阿尔法不是伽马或埃普西隆而感到开心，那些伽马或埃普西隆也因为他们是伽马或埃普西隆而不是阿尔法而感到开心。”^[2]权力运行机制让人们从本能上接受阶级观念和权力制度以求社会稳定，剥夺了人自由选择权力和批判性思维，将人类驯化成了生来就无法选择命运的牲畜，看似和谐稳定的幸福新世界，其实是极权主义下失去人性生机的一潭死水。

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指出，现代权力的规训并非传统的暴力压制，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规范、监视等来控制个体，使之成为温顺、合群的人。小说中伯纳德的转变和各阶级不同人的自我是身份认同完全印证了这一理论，而在现实里，这种个体性消亡的困境体现为社交媒体对人的单一评价机制：流量至上时代个体性表达的匮乏。点赞、评论、粉丝量等等数据构成了社交媒体的规范化裁决内容，我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赞，就会更倾向于发布符合大众期待、经过美化的内容，而非真实的、可能不受欢迎的情感表达。例如，用户小B是一位新手妈妈，在短视频平台倾诉育儿疲惫，却因内容“负面”而点赞寥寥。当她转而发布精修亲子照并配积极文案后，获得了大量点赞。这种流量推送和点赞机制通过数据奖罚悄然划定了“正常母亲”的行为边界，最终引导小B进行自我行为的规范，用精心表演的幸福取代了真实情感表达，小B发布内容的主体性受到流量的影响，其主导不再是个人情感表达，而是数据优劣与否，其本真个性也渐渐被隐藏。

伯纳德从根本上无从反抗，是科技极权秩序对人造成的高程度驯化的结果，揭示了权力机制磨灭人性的残酷真相。而科

技发展的当下，小说同样也为我们敲响了人的主体性与个性消亡的警钟，我们还有机会觉醒，避免重蹈伯纳德的悲剧。

3 科技和消费的奴役：单向度的人

列宁娜在思想上是新世界人类的“典范”，这个“土生土长”的新世界人的言行完全符合这个社会希望人所想、所做的。她没有自己的思想，她的“快乐”依赖于科技发展的产物——“苏摩”、香水和无伦理的性等。极端理性造成了情感真空，工具理性碾压价值理性，人思考的本性被磨灭，被科技和消费奴役的现代性困境今日仍待解决。

列宁娜完全沉浸在科技构建出的“完美世界”中，其生活被娱乐填满，科技为她所用，她也为科技所奴役。“为追求刺激，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充分利用已经运用到生活中的各种科技设施。他们终日沉醉在虚幻飘渺的虚拟空间里，根本无暇考虑作为人还有上升到理性反思的必要，更不用说培养个体德性的修养了。”^[6]列宁娜劝说伯纳德服用“苏摩”、自己受到任何一点精神冲击时都选择服用“苏摩”，是依赖于科技发展成果——“苏摩”的带来的精神麻痹；她评价一次旅行的好坏取决于有多少个“自动扶梯墙手球场”和香水的数量，表示她已经失去了欣赏新景物的审美能力；她本能地排斥生育和“母亲”，认为这非常下流，是不需要生育只需要孵化的科技带来的与人类本能的割裂；喜欢看物理刺激的感官电影，她作为观众不需要再积极思考以获得情感刺激，只需要被动接受感官上的生理刺激，是审美能力的缺失；她试图以“苏摩”引诱约翰，听到爱就以为是性，是情感概念的丧失……这些都是列宁娜被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所教化、规训的结果——她成为了单向度的人。“他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象同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它们是对已确定制度的肯定而不是否定”。^[7]列宁娜无法想象失去新世界科技和消费的生活方式，甚至被遗留在野人保护区是首先担心的是再也穿不上一件醋酸材质（代表文明人的服饰）的衣服。而更恐怖的是，在新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列宁娜，而是有千千万万个列宁娜，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

除了对科技极权秩序的麻木臣服，列宁娜还体现出被消费所奴役的悲剧性。新世界大肆鼓吹消费，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一件衣服破了，修补远不如买一件新的划算；“补丁越多越是穷光蛋”^[2]新世界寓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择手段，为了经济发展将消费与文明挂钩。小说里这种消费观被渗透给了新世界的每个人，达成了科技极权社会想要的目的，而当下现实也存在这种困境：“所有的消费品当它们被人们消费时，都不再是生产的产品而是一系列的象征着某种声誉、地位、欲望的符号系统。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赋予的意义，特定的消费体系成为一种特殊的编码系列。”^[8]现代社会也正

在用精准广告定位、短视频链接消费等方式构筑出更多的“虚假需要”，例如广告将奢侈品标榜为身份的象征、新款手机等同于时尚而被列入了“必买清单”，使得许多人过度超前消费或是冲动消费来为“虚假需要”买单，卖肾换苹果4s的悲剧今天依旧在上演，列宁娜的麻木不自知或许也就是被消费奴役的现代人的夸张写照。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整个新世界都被高度发达的科技生活方式、崇尚消费的价值观所规范化了，并且生产式地扩散开来（向全社会全世界全代际灌输符合新世界价值观地知识），单向度的人越来越多，更少地反抗科技极权秩序和不合理的消费观，人生来就认为这是合理的，再无思考和反抗，新世界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牢笼。“本来由人所主导的科学技术反过来主导了人，人成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品。”^[9]在许多科幻小说中出现了未来人类用科技造出毁灭世界的强攻击力武器，《美丽新世界》中的科学技术却是“服务于人的幸福”，然而这并不是真的“幸福”和合理运用。事实上精神上的摧残甚至比生理上的迫害更为可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作为导向，否则就会使得人被科技所奴役，而不是科技为人所用，这是赫胥黎对科技发展的合理忧虑和科技滥用的生存困境的警告。

当“3分钟读完一本书”的视频被精准推送给用户，有多少人会点开视频放弃阅读并全盘接受其观点？当AI能够写出逻辑完整，富有情感的符合用户需求的文章，有多少人会搁下笔选择娱乐？当广告铺天盖地地制造出“虚假需要”，有多少人会不应有的消费付出巨大代价？人类不应让渡出思考的权力，不应成为被科技和消费奴役的单向度的人。

4 反异己的围剿：被消音的人

赫姆霍兹与伯纳德、列宁娜同为阿尔法，但他拥有真正的思考与反叛精神，他主动放弃阿尔法特权，为自己选择了流放的结局，是他对人性 and 自由的追求的体现，他代表了新世界的觉醒者。然而他不被旁人理解，受到排挤和压抑，最终“被驱逐”，是挑战社会话语规范的悲剧结果。赫姆霍兹作为对脱离群体的声音被“围剿”，而现实的审判者并非小说中的唯一的最高权力者，而是无数个数字部落，从而造成了现代更专制更广泛的“消音”困境。

赫姆霍兹写诗赞颂孤独，违反了“集体快乐”原则，遭到举报，体现了新世界对于人的创造力本性的压制和对于异类的排斥，这无疑是最可悲的——人类不再允许个体产生新的思想和创造，除非你是规则的制定者，这种专制将使社会的未来将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赫姆霍兹嘲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贞洁观”，却无法理解“母亲”的生物学意义。很明显他即使是思想觉醒者，但不彻底，仍有被社会规训的残余。

究其根本，是接触不到这种书籍和其他思想的极权主义社会造成的。

相比于伯纳德对冰岛的避之若浼，赫姆霍兹欣然接受甚至是主动选择流放冰岛而非自杀或妥协，既是他对排除异己的社会的反抗，也是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于一个社会的成员来说，认识到自己的社会是一个疯人院，认识到自己被社会中的一些异己的统治力量认定是不正常的人是一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这个疯人院是人自己建造起来的，疯人院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自己时，那种痛苦就变得越发不能忍受。”^[10]在这种接近清醒的痛苦状态下，赫姆霍兹主动选择流放冰岛既是他寻求自我解放的突破，也是他作为“人”本该有的人性光辉的显现。即使这个社会尽力压抑人性、排斥异己，但总需要有人突破困境。

当下“赫姆霍兹”的存在更广泛，却并没有更幸运。数字时代各圈层间的对立和圈子内部的专制却让更多人被“攻击”。例如，“饭圈文化”的发展和泛滥造成了“围剿”与“被围剿”：用户小C在微博发表观后感，客观点评了演员A、B的演技。此举迅速招致A粉丝的围攻，被斥为“拉踩黑粉”，遭受人身攻击与举报。同时，B粉丝也为避免引战而批评其言论不当。小C自此被“消音”。而作为“围剿者”的B粉丝群体内部也可能存在分裂和互相攻击：替小C说话的被指为同谋，同样也受到攻击。社交媒体让人人都拥有了言说的权力，却也让人人都可能成为赫姆霍兹这样的被审判者，从而不敢言说，陷入被“消音”的困境。

冰岛有许多和赫姆霍兹一样的觉醒者，他们可能会一起交流、探索出真正的“美丽的新世界”的内涵并在未来建造出来，数字时代这样的现实性的困境又应该如何破局？我们呼唤理性交流和自由思考的回归，才能拥有个性化和合理自由，能够不再被同类套上枷锁。

5 结语

《美丽新世界》所构建的科技极权秩序，本质上是通过系统性剥夺人思考、审美、感受的权力，来完成对“人”的异化与规训，以让人无从反抗致使社会的麻木稳定。赫胥黎预见现代性困境的核心悖论——当社会试图以技术手段彻底消除物质匮乏与精神痛苦时，反而制造出更为深刻的生存危机。

在技术理性日益主导的当代语境下，赫胥黎的寓言在今天已有部分成为了现实。科技发展的便利异化成了枷锁：大数据的信息茧房和认知驯化成为“睡眠教育”的新型实现形式；短视频成瘾成为类似于“苏摩”的自我麻痹；AI侵入生活使人逐渐丧失思考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网络键盘侠排斥甚至猛烈攻击异己……然而，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警示，更在于启示。在技术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既要充分运用技术带来的解放

潜力,更要坚守人文精神的价值底线。我们呼唤人性的回归、人文主义精神的照耀,要警惕科技滥用和规训权力,保持作为人的真实、自由和思考,同时对未来抱有期待,期待着一个真正的“美丽的新世界”。

参考文献:

- [1] 王一平:《反乌托邦小说的科技伦理反思与吁求》,《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第78页.
- [2] 阿道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张晖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47页.
- [3] 李蓉:《深渊与拯救——<美丽新世界>主体之死与诗性经验》,《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第71页.
- [4]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 [5] 陈祝华:《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看<美丽新世界>》,《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49页.
- [6] 周小川:《“乌托邦”幸福的伦理之维——评<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华氏451>》,《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23页.
- [7]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 [8] 余源培:《评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6页.
- [9] 李增,刘英杰:《唯科学主义与极权主义双重挤压下的人性危机——论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5期,第86页.
- [10] 易丹:《“围栏中的豹”:西方现代派小说中人与异己社会的冲突》,《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三期,第80页.